

论“大跃进”时期 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思路与方法

张艳国 张德鹏

摘要:“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探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却在实践中选择了不太妥当的发展方法,主要是:第一,重在变革生产关系,借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二,过分强调生产力诸要素中人的重要性,而且,主要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三,用思想政治斗争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毛泽东出现方法论的失误,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出于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发展生产力急于求成,又片面追求生产力发展高速度,实行冒进的结果。

关键词:毛泽东 “大跃进” 人民公社 社会主义

一

关于“大跃进”产生的原因、过程与结果,学术界已有深入研究,但对毛泽东同“大跃进”的关系问题,还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例如,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采用的发展生产力方法是否妥当,就值得从历史与经验的角度来进行反思,本文拟就此略作述评,就教于同行。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何时,先进阶级及其执政党都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此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毛泽东深明此道,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建设中,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他都十分注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并一再强调其重要性。但对于究竟如何发展生产力,毛泽东的研究深度则是不够的,用毛泽东自己在 1962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说,“经济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他注意得较多的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犯了不少错误,用这些错误实践对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毛泽东的生产力“知识很少”,少就少在他抽象地理解生产力学说,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道路上,非理性地选择了不适当的发展方法。邓小平在分析毛泽东的失误原因时讲:“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美好的理想,离开了脚踏实地与科学方法,就会使事物走向反面。“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偏离了科学的轨迹,主要体现在:

第一,寻找发展生产力的着眼点是变革生产关系,借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变革的深度、广度及其方向,生产关系决不能超越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但反作用要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前提下产生,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急躁冒进,着力于变革生产关系,又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幻想借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创造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奇迹。对发展生产力的这一错误认识,表现在实践的方式和方法上就是大刮共产风,建立人民公社,企望人民公社带动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建立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当成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所以,毛泽东执迷于人民公社的美好的构想: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公社,构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人人团结友爱,一起生产,共同娱乐。类似人民公社的新村理想,毛泽东早年在长沙岳麓山下尝试过,未能取得成功,时隔许多年,社会沧桑巨变,他感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付之于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强行为之就带有明显的削足适履的色彩。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全面的不断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几十户、几百户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人民公社是历史的必然。其实,这种认识和推理是感性的、肤浅的,“农业全面的不断跃进”,只能说农业较之以前有所发展或有较大发展,怎么能说这是建成人民公社的生产力基础呢?沙滩上可以建房子,不可以建摩天大楼,“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是上层建筑的东西,与建立人民公社更不能成为因果关系。但《决议》被通过,可见当时党内包括毛泽东,离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及其规律来考虑生产力发展问题,已成为一种思潮。因此,北戴河会议后,全国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热潮,就一点也就不足为怪

了。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人民公社先在农村搞,再推之于城市,“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国家组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中国在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主主义革命后,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人民公社,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威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乐观估计。可惜的是,社会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是历史上多么伟大的巨人,因为社会进步有铁定的法则和自身演变的轨迹。

人民公社超越社会现实,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有多种表现:在所有制方面,实行政社合一的公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几近消除;在社会集团的关系方面,集体共享个人财产,公社内部否认差别,统一核算,公社之间贫富拉平,无偿调拨;在产品分配形式方面,实行平均主义供给制和部分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党内以陈伯达为代表的少数人,更主张废除商品、货币,产品由国家直接分发,公社内部搞“按需分配”。超前的生产关系首先在农村强行建立起来,人民群众“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毛泽东以为照此下去,“共产主义开了花,水利化、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将接踵而至,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会把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带上令人难以想象的新台阶。然而,无情事实表明,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彼此相适应的规律,反作用只能朝着与进步相反的方向作用,必然地限制甚至妨碍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指出:否定生产力发展之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虽然没有能够看到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但他的理论却料事如神。我国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很快出现,生产关系显示了它被人为拔高后,迟滞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毛泽东所信奉的“真理”经实践检验同真理有太大的出入。原因很简单,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础根本不相适应。试想,在落后的手工劳动基础上,农业合作社刚刚建立,就急于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甚至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财富并未充分涌流,甚至相当贫乏,有的地区连温饱都未解决,就企图实行供给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历了漫长历史阶段才实现的工业化、现代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我们居然想一下子实现并超越它,取消社会分工、消灭商品经济和三大差别,搞共产主义,如何可能?因此,这种生产关系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便无从谈起。最讲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在晚年偏离实事求是,重蹈了他过去所批判的主观主义覆辙。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人为变革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借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来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不可能的。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面对出现的严峻形势,对“大跃进”反省时,不得不说:“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了点。”

第二,过分强调生产力诸要素中人的重要性,希望依靠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和发挥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唯物史观认为,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人(劳动者)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即生产资料,是生产力构成中物的要素。在生产力矛盾体系中,人和物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在生产力系统中,人是具有特殊思想的能动性活物,虽然人也包括在生产力广义的物要素中,但从能动性方面来讲,人是掌握物、创造物的因素,所以,重视人、重视人的创造力没有错。但必须注意,在生产力中,以生产资料为主的生产力物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力的性质,是生产力水平的衡量标准。毛泽东在“大跃进”过程中,丢掉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武器,不讲“两点论”,只讲“一点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自觉地落入了主观主义片面性的窠臼,如同轻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一样,毛泽东也轻视生产资料对生产力的重要性,而且,毛泽东重视人,特别是人的精神和意志力量,忽略人在社会实践中的技能,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技能是可以被超越的,仿佛牙一咬,就可以让飞机上天,气上鼓,就可以让河水倒流,这是唯意志论在起作用。

“最为天下贵”的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这一点从长远来看勿庸置疑,不过,从某一历史阶段人类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基础来看,人的实际创造力则是有限的,就是说,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总是要受到既定条件的制约,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得清楚明白:“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从无限中看到了有限,也从物质技术基础的有限中片面地看到了人的精神力量的无限扩张,毛泽东年轻时研读过谭嗣同在《仁学》中主张的“心力”之说,还以《心之力》为题写了篇文章,对“心力”问题作过较多阐述,诚信“人力或做不到,心力当无有做不到”,后来,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神秘的心力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用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作指导,迈着坚实又稳健的步子,走到了新中国。革命成功了,在那样艰难困苦条件下取得成功,使毛泽东看到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力量,进而推崇“人定胜天”的传统观念,并把它推到一个新的境界,却又走到了极端,这就是认为,“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信念的力量)“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这种无限大的创造力可以撇开生产力中物的因素,恣意发挥作用,创造所有看似难以企及的人间奇迹。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起一定作用,不存疑义,但作用“无限大”肯定是不行的,“有限大”作用也得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显示出来,一定前提条件是指主观的计划、设想要符合客观规律,依照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从自己戎马一生的革命经验出发,又被“凭激情追求目的”的浪漫主义气质蒙住了眼睛,认为人的“心力”即主观能动性无限大,这就陷入了经验主义。在革命

战争年代,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用小米加步枪,赶跑日本侵略者,打败国民党,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与他熟悉革命战争特点,尊重客观规律,始终强调改造革命者的主观世界,注意鼓励革命者的主观意志,提高革命者的素质分不开。那时,国际国内的反革命与革命力量对垒,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因此,人的生存本能和潜能能够最大限度地被恶劣环境激发出来。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情况与条件同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党的工作重心变化了,搞革命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方法也有极大的差异,此时,如果硬要照搬过去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以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不依条件发挥不可限量的作用,这就要犯历史性错误。毛泽东不以为然,在毛泽东大力提倡和推进下,各地报刊杂志以及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唯心主义口号,如“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等,并对“条件论”大加挞伐,《人民日报》声称:“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地的产量是由人的胆量决定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一时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大行其道。在理论上讲,如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民族就会失去理性,主体实践就会陷入混乱。

第三,把思想政治斗争当成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尽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因而它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就有一定的限度。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什么呢?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未作论述,毛泽东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探索,也未找到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认为社会基本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他又认为,我们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是这些矛盾在推动社会发展,因而,他把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重点放在了思想政治斗争层面上,通过思想政治斗争,来保证“大跃进”不受干扰,顺利进行。他的观点是:“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经济建设工作与思想政治斗争挂上勾,很容易变成阶级斗争,使人民内部矛盾发生质变。毛泽东就曾说过:“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斗争方法就是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搞群众运动是当时的一大特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重要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

理。毛泽东推崇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指导革命实践,因此,一生都热情礼赞、高度评价群众运动,他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⁴⁰在对敌斗争、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各领域,毛泽东十分善于领导和发动群众运动。唯物辩证法认为,从来就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如果将原则不分条件、地点地机械运用,那么,原则也会失去魔力。在晚年的“大跃进”实践中,毛泽东仍然沿用“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之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⁴¹,忽视社会主义建设和民主革命在内容、形式上的诸多差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沿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组织经济建设,以政治热情代替经营管理技术能力,使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轰轰烈烈,热气腾腾,一浪高过一浪地搞了起来,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书记动手,全党动员,全民发动。大炼钢铁,全国参加人数达到9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6;人民公社化运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参加公社的农户占全国各民族总农户的99%以上,基本上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在这场“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浪潮中,毛泽东在思想政治领域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所谓的“保守”现象,对运动中甘居下游、畏首畏尾、思想不解放者,即对经济建设持要稳步前进正确主张的部分同志进行批判,轻者警告、记过、撤职、留党察看,重者在组织上采取严厉措施,“拔白旗”、“插红旗”,将反对者拔掉,以扫清“大跃进”的障碍。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罪名之一就是“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思想斗争演变成了阶级斗争。一时间,这场思想政治斗争确实起到了毛泽东所期望的效果:全国上下认同毛泽东的大手笔,从思想乃至行动都统一到毛泽东选定的生产力“大跃进”路线上来。

“凡事过则反”。破除迷信连科学也被无情地破除了,解放思想成了解放胆量,思想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斗掉了一些人的良知:一部分人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和政治热情以及善良愿望,不辨是非,只顾盲从;一部分人明哲保身,违心附从,睁着眼睛说假话。对领袖意志的盲从和一部分人的明哲保身,其结果是全民参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朝改夕成。全民大炼钢铁最有代表性,1958年钢产量翻番要求完全超过现实可能,毛泽东不得不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还是勉为其难,最后,钢产量从统计数字来看,完成了任务,却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说假话的结果是遍及全国的浮夸风,到处牛皮哄哄;在农业方面,各地人民公社瞒天过海尽说大说,一颗颗高产“卫星”从田野腾空升起,什么水稻亩产上万斤、小麦亩产12万斤、山药亩产120万斤、一颗白菜计划长到500斤等,闹了一个又一个天大的笑话。“大跃进”由“人间奇迹”、“现代神话”经实践检验还原成了“人间笑谈”。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现实

同理想和目标相悖,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严肃问题:在现实和目标之间,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实践过程的手段与方法需要琢磨。这是任何聪明的人都不能忽视的。

二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方法的错误源于他发展生产力的主观主义指导思想,就是希望“一天等于20年”,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使我国生产力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中华民族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二次会议政治报告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课题。”会议通过的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力,正如《人民日报》社论中所讲的:“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彻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⁴²从此,“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成了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毛泽东所以要高速、要赶超,根子固然在于他的主观主义指导思想,但他所领导的事业一直以来总是如愿以偿地获得成功,无疑助长了他的骄傲自满和自大自信,以致他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毛泽东从这些“小跃进”的成绩中确实看到经济建设不神秘,不比打仗厉害,他的主观主义思想有了现实佐证。而且,毛泽东是个对国家、对民族饱含深情的爱国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新中国始建,国穷民困,生存环境险恶,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攻击我们,在经济上封锁我们,社会主义面临着巨大威胁,后来,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还撤走专家,取消对中国的援助,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与民族自尊心由此表现得更为强烈,他认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⁴³;只有快速发展生产力,我们才能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不是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叫嚷的“经济零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才算根本建成”⁴⁴。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能经常地带来良好的效果,愿望同效果之间,需要科学方法连缀成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一般地说,追求生产力发展高速度本无可厚非,如邓小平就说:“发展是硬道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⁴⁵1917年列宁也曾说过:我们“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⁴⁶然而,生产力发展有其自身特定规律,以发展速度而论,发展必须有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要实行渐进,切不可急于求成,一蹴而就。邓小平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发展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他告诫我们:搞社会主义,“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⁴⁷毛泽东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无视客

观规律和实际困难,把发展速度放在第一位,彻底偏离生产力发展的渐进原理,对此,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有过反对意见,认为盲目追求速度就是冒进,可毛泽东固执己见,力排众议,武断地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反复批判反冒进,警告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大跃进”始于反冒进,反冒进的过程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发展以及生产力错误方法不断升级的过程。

毛泽东早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⁴⁸“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发展生产力选择了不适时宜的桥和船,结果一如毛泽东自己所料,过河成了空话,“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总结过去20年的历史,痛心地说:“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⁴⁹,“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⁵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道,已经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务实高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镜子。这是当时的实践者所不曾料到的,历史就是这样喜欢跟人们开玩笑,大概这就是历史的奥秘与魅力之所在吧!

注释:

-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8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 15 19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116、375~377、115、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载《红旗》,1958(4)。
-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4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转引自刘明华:《大同思想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影响》,载《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97(1)。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7~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 《年底算帐派者输定》,载《人民日报》,1958-08-30。
-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8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人民日报》,1958-09-24。
- 11 《胡乔木文集》,第2卷,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 《力争高速度》,载《人民日报》,1958-06-21。
- 1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8~8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4 转引自谢经华主编:《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3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 15 《列宁选集》,第3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7 《毛泽东选集》,第1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 430077
华中科技大学政法系 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Q)